

，大體可分爲1. 群衆性活動，如校際性、全校性、班際性或全班性的活動。2. 小組活動，這是基本形式，大致有學科小組、科技小組、勞動技術小組、藝術小組、體育小組等形式。3. 個別（人）活動，這是在教師指導下進行獨立工作的形式（羅正華，1986，頁334～6）。

最後，就課外活動的管理與輔導而言，孫喜亭等（1990，頁357～362）指出：主要由四方面負責組織與領導：一、學校和教師直接組織和領導，二、學校共青團和少年隊參加組織與領導，三、校外教育機關組織和領導，四、家庭和家長的教育與指導。

綜上所述，可知大陸教育當局，深感外在環境急驟變遷，必須採取多種途徑及多種形式來實施德育，進行思想政治教育，才能增進效果，此點由《中學德育大綱》（試行稿）中即可看出。

## 第五節 問題分析與檢討

由於學生學習歷程中的得失第六章已談，因此本章將側重德育方面。對於近十多年來大陸高中德育成效的評價，大陸學者看法即不一致，如中國教育學會第三次學術討論會中與會者的意見分成三種：「(1)德育雖然被提到五育之首，但長期未能到位，導致中小學德育水平下降，學生的政治方向、道德品質都不及文革前的狀況，教師的師德水平也在下降；(2)十年來，中小學德育得到了改進和加強，有了大綱、教材和學生行爲規範，德育工作開始走上序列化、規範化和科學化；(3)教育失誤的主要表現不是整體德育的削弱，而是有所加強有所忽視，有所改革有所淡化，不能籠統地講德育的失誤，而要做具體分析

○」(趙閻先, 1990, 頁33~4) 換言之, 評價有反、有正及正反兼俱三種。不過顯而易見的, 過去大陸德育工作的推展, 主要須面對三方面的挑戰, 一是內外大環境政經情勢的改變, 二是地方黨政及學校領導人重智育輕德育的傾向, 三是高中生本身思想價值觀的改變。第一項, 由對歷來政策的分析可知。至於第二項, 從一九七七年大陸教育逐步恢復後, 中學重智輕德、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傾向便漸漸出現。因此「教育部」先於一九八二年一月廿一日發出《關於當前中小學教育幾個問題的通知》, 以糾正此一缺失。次年年底, 又進一步頒發了《關於全日制普通中學全面貫徹覺的教育方針, 糾正片面追求升學率傾向的十項規定(試行草案)》, 其中第四點要求「要加強對學生思想政治教育。畢業生的操行評語要如實反映學生的思想品德狀況。嚴格按照規定的條件評定三好學生、優秀學生幹部和發展共青團員」(張健, 1986, 頁84~85), 以糾正重智輕德之失。但似乎並未全面改善, 故以後仍三令五申。不過, 若依第二節分析高中及高校入學機率都不及25%看, 在升學競爭依然激烈的情況下, 想要步入正軌, 仍有相當的困難。至於第三項, 則是關係德育工作成敗的重要變項, 故本節將先以此為討論主題, 分別探討目前大陸高中生的價值觀、政治態度以及青少年問題等三項子題。

然而, 除了高中生個人因素會影響其成效外, 大陸「德育」工作本身性質的缺陷, 亦是影響成效的因素之一。故最後將檢討該項問題。

## 壹、價值觀

由第二節的分析, 無論從需求傾向或價值觀觀之, 已略可看出現

代中學生個人傾向重於群體傾向。此種現象，在以下部分地區的報導或研究中亦可看出。

一、魯曉敏（1991，頁28～30）曾對所任教之吉林省東豐縣一中一百四十名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，結果發現高中生有以下傾向：

- (一) 要求自主、自立、要求開放；
- (二) 商品觀念增強，重職業，輕事業，羨慕有技能的人；
- (三) 講求實惠，追求價值，特別是重視自我價值；
- (四) 追求新的生活方式，要求發展友誼，發展社交；
- (五) 要求新知、新信息，不滿足老一套，對老師講的新知識、新信息則感興趣。
- (六) 勤於思考，不盲從、不迷信，對於教育者所提出的問題總喜歡問為什麼。

在調查中，針對第二項，有學生反映：「理想是空的，前進是虛的，有了技術才是實實在在的。」另亦有人作詩道：「苦讀寒窗十幾年，大學畢業七十元，初中畢業做買賣，一天就是幾十塊。」又針對第三項，學生們反應，要宣傳「個人自由」，少講點「集體主義」。在調查個人對職業選擇時，一百四十人中，絕大多數想當企業家、科學家、專業技術人員，只有一人想當教師，至於農民或黨務工作或思想政治工作的都沒有。故作者以為這反映了一種實用主義的價值觀。至於第五、六兩點，與思想政治教育有關，稍微再談。二、李意如等（1988，頁17～20）指出：追求新知，渴望成才；愛美求樂，嚮往新的生活方式；需要友誼、尊重與理解等，都是其思想上的特點。惟作者指出，青少年雖想成才，但對於成才是一條艱苦拼搏的路想得不多；另近年興起的「音樂熱」、「跳舞熱」、「集郵熱」、「旅遊樂」等，

都反映其對新生活的追求。三辛暘（1991，頁278）一九八六年對北京市28所中學1871位高中生進行思想狀況調查，其中發現學生存在「輕視勞動，怕艱苦奮鬥」的現象。46.9%高中生，「誓與北京共存亡」，不願去外地、邊疆、農村學習工作；另有47.6%高中生見浪費糧食不心疼。四鍾義偉等（1991，頁60）指出；他們喜歡用逆向思維來對待教育者的工作、對社會缺乏了解、社會責任感不強、集體觀念淡薄、缺乏艱苦奮鬥的精神。透過這些描述，實不難感受這一代大陸高中不僅有個人傾向，尚有實用、功利的色彩。而此種價值觀正與當局強調的社會主義、集體主義背道而馳。儘管教育部門想透過德育的力量去扭轉、引導，但終非易事。這或許是推行一胎化政策及改革開放時，所必須面對的兩難吧！一旦一九七八年以後出生的這批嬌生慣養的「小皇帝」進入高中後，高中德育工作恐將面臨更大的挑戰。

## 貳、政治態度

目前大陸高中生的政治態度，應是黨政當局注意的焦點。然而對此問題，卻有正反兩面不同的評估。

### 一、正面研究

1. 辛暘（1991，頁274）引述有關部門調查九省市自治區14177名中學生的資料指出，82.4%的學生願意為祖國作貢獻。而他一九八六年對北京市一八七一名高中生所做的調查中，有93.3%的高中生擁護四項基本原則、黨的方針、政策、政治態度正確；有78.03%者思想認識正確。（全前，頁277~9）

2. 李意如等（1988，頁15～16）曾對北京不同類型學校的504名中學生進行調查後指出：90%以上的學生「渴望祖國富強，追求自我完善。」
3. 趙翰章（1987）引述有關調查指出，「關注民族和國家的前進和命運，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和主人翁感，是中學生的思想特點之一」。

以上所列資料，多半只能說中學生有國家觀念，但未必表示對政治或共產主義有濃厚的興趣。

## 二、反面調查

1. 第二節所引朱智賢一九八一年對十省所做的研究中指出：對時事政治不關心，很少聽新聞廣播和看報等，城市一般中學為39.1%，省市重點中學為35%，工礦區中學為48.5%，農村中學為44%（韓進之，1991，頁106），平均約為40.98%，換言之超過五分之二受試者對時事政治的興趣不高，此一比例不能算低。又同研究亦指出對課外活動不感興趣，或只參加學校規定的課外文體活動，平均約為29.2%（頁105），換言之比率近三成。另潘仲茗等（1991，頁26）所做調查指出，53.9%的學生根本沒有參加課外活動，而剩下的46.11%中，每週活動時間少於1小時者，竟佔65.4%。如事實如兩項研究所述，則德育大綱中企圖要透過課外活動實施德育的想法就不易做到。
2. 前引辛暘的研究亦指出，平均有13.67%對馬列主義基本觀點認識錯誤，另有8.3%者則是認識模糊（頁227～8）。

3. 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」潘仲茗等（1991，頁23）一九八九年對北京等九省市進行普通高中情況的調查分析，在學生7837人、畢業生1721人中發現：16.5%的學生最不喜歡的課程是政治課，其主要原因是感到「枯燥無味」。部分學生把政治課當作升學的「敲門磚」生吞活剝，死記硬背。另外，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比率達31.9%。另蕭業炎（1989，頁85~7）亦指出：「據有關部門調查，在各級學校中，思想政治教育課受歡迎的程度普遍大大低於其他專業學科；中學稍好一點，都是為了進入大學為“敲門磚”。」而更大的問題，是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出現的嚴重逆反心理。造成的原因，他認為有三點：一是“一傳眾咻”的局面出現，使得學校思想政治教育流於形式；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所蘊含的“善”和“美”，並未完全立足於現實生活中的“真”。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陳舊，沒有在新形勢下及時更新教學形式，也相應加劇了逆反心理。對於學生抱著應付考試的心理，在前述中國教育學會第三次學術討論會中，與會者亦曾提及。（趙閻先，1990，頁34）至於教學上的缺失，魯曉敏（1991，頁33）指出當前政治課教學有待改進之處有三：一是封閉式，即完全局限於課堂教學，學生是充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讀案前書。二是灌注式，老師講，學生聽，滿堂灌。三是備考試，死記硬背，以求在考試中取得高分。如學生對政治課不感興趣，只是應付考試，則欲以此來培育學生正確的政治思想其成效將很有限。
4. 《中國日報》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七日報導，角逐上海「傑出學生」榮銜的五十六名中學生，在一項中共黨史測驗中表現甚差。其中有半數不及格，而最低者只有四十分。近八成受試者不

知辛亥革命日期，另有十五名（超過四分之一），考生答不出「四大堅持」（轉引《聯合報》，八十年六月十八日）。

如果上述正反兩面，都因屬抽樣研究，也都反映了部分事實，則正面的結果的實不足喜，因為負面的現象已足以讓大陸黨政當局十分憂心。因為外在的壓力終不足畏，可畏是學生內心的冷漠與抗拒，這才是危機所在。

## 參、青少年問題

隨著經改政策推動，大陸社會近十年亦快速變遷，因而也衍生出一些青少年問題。蕭宗六（1988）曾舉出了五項：一是學生吸煙問題，大陸有部分中小學生有吸煙的行為。依照《中學生守則》第六條規定，這是被禁止的行為。二是學生早戀的問題。這是由於學生性早熟所起。早熟的現象，夏炎對桂林市中學生的調查後亦有類似的發現（吳振成等，1987年，頁288）。而左其沛（1990，頁144）亦指出「早戀」各地調查的數字比例有不少出入，但有一個大體相同的結論：中學生早戀有日益增多的趨勢。三是學生「鬧事」問題。這是指學潮。四是學生犯罪問題。他舉例到，一九八六年初，太原市破獲一竊盜搶劫集團，八名罪犯竟都家長學校視為好學生的高三生，其中六人是共青團員，四人是學生幹部，有人還連續十一年被評為三好學生，而家長中，有局級幹部、工程師、學校領導及教師。這批學生一九八五年內作案42起，所得財物價值一萬餘人民幣。五是學生輕生問題。他認為造成的原因有六：（一）學習壓力，（二）高考壓力，（三）教師的體罰與侮辱，（四）同學的歧視，（五）失去家庭溫暖，（六）精神頹唐。（仝前，頁210～217）

試觀上述問題，其中吸煙、早戀、輕生屬於行爲或心理問題，而犯罪雖屬法律問題，但亦有其心理根源，只有鬧事涉及政治思想問題，故高中德育重點，不宜將焦點完全放在思想政治教育上。而在這些問題，犯罪問題，似乎更令大陸教育當局擔心。北京市中學生違法犯罪案，一九七九年四月，中共中央轉發中共宣傳部、「教育部」等八個單位《關於提請全黨重新解決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的報告》，並於通知中要求大力加強對青少年，特別是在校中小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，以減少其違法犯罪。至於實際犯罪的情形，以北京市爲例，一九八六年中學生違法犯罪率爲千分之一點六，一九八七年爲千分之一點二，一九八八年一至十月，較去年全期下降千分之零點三，而總人數爲246人（李鍵，1990，頁369）。至於上海市中小學違法案件，一九八八年與一九八七年略同（仝前，頁493），但卻具體數字。又一九九一年元月《北京週報》報導，大陸青少年犯罪問題日漸嚴重，而且有暴力化及幫派化的趨勢。報導指出，目前二十五歲以下青少年的犯罪占有所有犯罪的四分之三。而第一次犯罪的平均年齡，也由一九九〇年的十六點七歲降至十四歲。又青少年犯罪中，超過四分之三的案件涉及偷竊、搶劫和詐欺，其他尚有謀殺、暴力攻擊和性犯罪。至於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，報導則分析是由於十三年來的經濟改革和門戶開放，使現今青少年一面企求獨立，一面貪圖錢財與奢華，因而易於鋌而走險。且大部分罪犯來自破碎家庭、獨子或么子。另黃色書刊、電影的流行，亦是重要成因之一（轉引自《中國時報》，八十年元月十五日）。另西德《明鏡週刊》引述「國家教委」的一項調查指出，「從五十年代至今，中國大陸中小學生的犯罪率上升了五十倍，犯罪的內容也從街頭打架，轉向暴力殺人、搶劫。」（轉引自《聯合報》八十一年二月十九日）由上所述可知，青少年犯罪的問題，的確是個



應該加以注意的問題。而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，除了其個人內在的心理因素外，尚包括大陸近年來家庭結構改變，部分地區社會快速變遷等外在的社會因素，又其中等教育結構與課程未能與社經改變配合，且升學壓力頗重都是可能的原因。因此如欲解決此一問題，不能只從學校德育入手，更不宜與思想政治教育混為一談，而宜從學生心理及家長等方面入手才能防患於未然。

## 肆、德育性質

經由前述的分析，可知大陸高中生在價值觀、政治態度及生活行為上，都反映出若干負面的現象。若檢討其中的成因，除了受到外在快速變遷社會、經濟的因素影響外，大陸德育工作的本質存在若干爭議，恐怕亦是影響因素之一。因為大陸所謂的「德育」若分析其概念的內涵與外延，則可發現其在性質上近於「灌輸」的概念，而非「教育」概念。其採取灌輸的方式，若是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，或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，但是大陸自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，民智漸開，自然不易再形成一元化的價值觀與政治態度。針對此點，茲簡析如后：

一般所謂「灌輸」，可從教育的動機、方法、材料與結果等四方面來分辨：一、如果施教育的動機是邪惡、閉塞、不可告人、悖理的，則屬灌輸；二、如果方法是反理性、反認知的，或固定前提或結論的，則屬灌輸。三、如果材料是悖理、閉塞的，則屬灌輸。四、如果所形成的結果是反理性的，悖離認知事實或價值判斷的，則屬灌輸（歐陽教，民25，頁288）。換言之，如果符合含認知性，含價值性及合自願性三項教育規準，（歐陽教，民62，頁14-17），則屬教育，反之，則是灌輸。如以此一角度來看大陸的德育，則其在性質上恐屬灌輸。

首先，就其動機而言，共德育的主要目的仍是為政治服務，旨在

強化學生對共產黨及共產主義的效忠，而並非將提昇學生個人品格情操列為首務，如此一來，教育遂淪為達成政治目的手段。

其次，就其方法而言，當前大陸中學常用的德育方法有四種（趙翰章，1987，頁119—144）：一說服教育法，這是以馬列毛思想為指導，通過擺事實、講道理、樹典型等方式，來提高學生的思想認識。二陶冶教育法，則是透過情感及環境對品德的影響作用，來對學生進行薰陶、感化。三實際鍛鍊法，主要是透過學習活動，社會活動及制定和執行學校各科規章制度等方式來進行。四品德評價法，主要是採取獎勵、懲罰、評比競賽、操行評定等四種方式來進行，在言四種方法中，以說服教育法最常也最廣泛地被採用。然而此種方法，由前述學生對政治課的負面態度，已反映其缺失。而且道德教育重點之一，是在培養學生道德認知與判斷的能力；如果採說服的方式來施教，實與學理相違背。

其次，就教材而言，由於大陸德育概念的內涵中，包括思想品德教育和政治教育，因此其教材中自然參雜許多政治意識型態與教條，而且歷年共黨的重要政策與文件，亦都成為學生學習的主要材料，但是這些內容往往都經不起理性的分析批判。因此如果一定要強制學生接受，自然會產生反效果。

總之，大陸德育工作如欲發揮效果，除了加強對學生的輔導外，從本質上改變「灌輸式的德育」，也應是努力的方向，然而此點卻與其共產體制本質相矛盾，因此恐不易為大陸教育當局接受。如此，未來大陸高中在思想政治教育上，將遭遇更多的挑戰困難，應可預見。